饶家驹与淞沪会战初期的人道救助

◆ 苏智良 王海鸥

饶家驹来自法国,二战期间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他是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的主要创办人。由于准备充分,第一收容所的设施比较完善。它占地20亩左右,有大芦棚7幢,其中4棚收容妇女,3棚收容男子及孩童。另外还有7处不同大小的芦棚,2处是办公室,3处是厨房,分别用来做饭、做菜与烧水,还有1处是一个小型的医院,包括诊室与病室,最后1处是难胞的男女浴室和理发室。所内还配置了大量的电灯和充足的自来水。

饶家驹

1937年夏天,当卢沟桥事变、平津失守、淞沪紧张之际,饶家驹就已经敏锐地预感到中日在上海的交锋已不可避免。想到战事一旦发生,战区人民势将流离失所,作为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的饶家驹,便与宋汉章一起考虑建立统筹救济事宜的国际组织。于是,上海华洋义赈会联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世界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中华公教进行会,选出11名代表,组成具有国际性的救济会,定名为"上海国际救济会"。随后又邀请了各国驻华领事、各国商会以及其他正式团体共同参加。

8月13日,上海国际救济会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会议,参会者除原有的六团体外,还增加了中国佛教会、上海青年会、法国商会傅立德、前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钟思等,会上公举奥尔、柏韵士、钟思、傅立德等十人为常委。18日又召开会议,推举屈文六、奥尔为会长。其总部设在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国际救济会中,饶家驹任常务委员及救济组副主任,兼任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所长。

由饶家驹任领导的救济组主要负责开办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的工作。战事爆发后,上海难民骤增,国际救济会先后设立6个难民收容所来收容难民,至1938年8月下旬,一共收容难民6万多人。饶家驹亲自担任第一难民所所长。受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领导的黄定慧在《上海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四个月工作报告》中,详细地讲述了第一难民收容所的成立始末:

跟着敌人侵略战争的展开,把整个大上海形成了东战场的最前线,上海以及附近的居民,都被炮火轰离了他们的生活场所,或是居住地址,而流浪到了每个不相识或非素识的街头。没有食粮,也没有用具。

记得经过八一三和八一四几天数万人在马路上的露宿,我们虽是由团体设法布施食粮,但总觉得不能再忍耐着眼看这种悲惨生活的继续。也巧震旦大学才院长和饶神父发伟大的善心,就在八一五的那天,借顾守熙先生的客厅,和陈志皋先生、黄定慧先生商定在震旦大学操场上,盖搭芦棚,建造起一个规模较大的收容所。后来,我们连续好几天,每天在圣彼得堂饶神父的课室里,加入了威尔逊先生,潘肇邦先生,顾吉生先生和毛霞轩先生共同商量,决定组织一个理事会来管理这收容所。

刚开始几天食粮,是由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来帮助的。收容额为一千五百人,设备还没有完竣,难胞的人数已经足额。继着饶神父主持的华洋义赈会,又联合了其他团体,成立上海国际救济会。于是在饶神父直接领导下的震旦收容所,被编列为国际第一收容所,而收容的人数也重新由一千五百人扩充为二千五百人。理事会公推饶神父为正主任,副主任为顾吉生先生,兼管理会计及庶务事宜外,其他各组的工作和事业的推进,都付与黄定慧先生任总干事之责。同时,饶神父仍邀集原来理事会的几位先生,每星期一在他的地方,为全体难胞解决许多增进福利的事情。

由此看出,饶家驹是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的主要创办人。第一难民收容所的组织也比较健全,除设正、副主任和总干事外,还设有副总干事和秘书,以及收容、训导、卫生、警卫、给养组,每组干事大多由大学生、留学生等文化道德修养比较高的青年人担任。而比较重要的会计和庶务组也由副总干事顾吉生亲自选派精明干练的人来办理。在日常事务上,总干事负责在饶家驹的领导下处理对内对外的一切事务,而副总干事负责处理内部日常事务以及协助总干事处理其他事务。秘书则负责文书和交际两项工作。收容组负责难民的登记、难民人数的统计、难民的管理和遣送,训导组担任难民的教育与组织,卫生组担任衣服、医药以及清洁方面的工作,警卫组担任保护与警戒,给养组担任食物的供给与分配。健全的组织机构使得各部门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高效地处理所内的各项事务。用人方面又多选择精明干练、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使得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展开。第一收容所健全的组织模式和高素质的工作人员是其成功的关键,这些因素很多都被后来的南市难民区所借鉴。

由于难民逃难时只携带了少量的食物,而维持温饱是难民最基本的需求,因此在收容所内,难民的吃饭问题是需要着重考虑的。在国际救济会的收容所里,此项事务由给养组专门负责,本着"费用省、营养足、分配匀"的原则,给养组与卫生组、庶务组共同商定采购蔬菜的种类,以使花费低而营养充足。厨工均由难民担任,由于难民人数众多,这样难免产生一些难民混进厨房偷吃食物的现象。为此,厨房工作人员一律要求佩戴绿色袖章,无袖章者不得进入厨房。难胞们每日进餐两次,分别为上午10时及下午5时。由于资金有限,菜食以黄豆芽、青萝卜干、豆腐和青菜为主。还有一些外国的妇女每天两次来为婴儿和生病的儿童分发牛奶。

尽管难民们在物质生活上稍显匮乏,但其业余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为丰富难民生活,第一难民收容所还举办了各种比赛。1938年7月3日,收容所举办了"生产杯"足球赛,两队分别起名为"震混"队和"西联"队,比赛结束后,两队队员和当时难民收容所的总干事黄定慧合影留念。难民在收容所也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如结绳、制衣等。难民在收容所内按年龄、性别、程度分级接受教育,还有儿童唱歌队、孩子剧团等组织。收容所每日举行一次清洁运动,"值日者将棚内所有被褥、衣服运至旷地曝晒,由清洁队将棚内扫洗消毒,并每月由各棚将所用衣被沸水泡煮,藉以消灭臭虫蚤子以及细菌"。

在一年的时间里,第一难民收容所共收容难民6886人,以妇女儿童居为多。由于饶家驹后来忙于南市难民区的相关事务,所内具体事务由饶家驹的助手潘大成担任所长、副总干事。这个收容所直到1939年12月才关闭。

(选自《上海拉贝:饶家驹》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第1版)

回忆长乐邨

——在公公丰子恺身边的日子

丰南颖 丰意青

22.学到不少气象知识

我们从小从公公那里学到了不少气象知识。早上天亮后,公公总是从阳台的窗户朝外看看,如果外面雾蒙蒙的,或大冷天对面房顶上有霜,他就会说"浓雾晚暖"或"浓霜晚暖",关照我们"今天等一下会热起来的,出去不必穿太多衣服"。上海的冬天难得下雪,常常是多日阴雨绵绵的天气,一直不见晴天,一旦下了雪,公公便说"见雪为晴,明天一定出大太阳",果然第二天阳光灿烂。每次看到二人同时要上厕所,公公便笑着说:"抢马桶要下雨了。"这样的"公公天气预报",我们至今还在应用,准确度很高,绝不亚于现代化的天气预报。仔细想想,"浓雾晚暖""浓霜晚暖"和"见雪为晴"这样的预报,想必有科学基础,大概源出农谚,准确并不稀奇。

公公对我们解释了冬至和夏至的天文意义。由于太阳与地球的位置变化的原因,冬至是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在每年12月22日左右,夏至正相反,在每年6月22日左右。公公告诉我们,"邋遢冬至干净年,干净冬至邋遢年"。意思是说,如果冬至那天下雨或下雪,湿嗒嗒的很不干净,那就意味着阴历新年或春节会是个大晴天,反之,如果冬至那天是好天气,阴历新年必定是个雨雪天。这样的预报也非常准。

小时候我们从公公那儿听来一个很形象化的关于夏天的民谣,现在只记得前面几句了:"一九二九,扇子不离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公公说头九从夏至这一天开始算起,每九天为一九,此次类推为一九、二九、三九……直到九九。这81天包括了一年中从较热到最热的日子,然后到凉快的日子。夏至开始气温十分地炎热,那时没有空调,人人汗流浃背,手里拿着蒲扇不停地扇,小孩子常常买棒冰、雪糕,或是冰淇淋吃,公公自己则是茶水不断,喝茶也是他的一大爱好。夏天除了加饭酒外,公公也会喝啤酒。

公公一直对冬去春来、节气变化很敏感。春秋之际,我们常听到公公感叹气温的变化无常:"二八月,乱穿衣"(阴历),他会关照我们,这个季节里天气变化多端,穿衣服当心不要受凉。九月份虽然已入秋,有时还是感到很热,但天气渐渐开始转凉了,公公说,"白露身不露",要我们小心别着凉。我们还常听到公公怀念当年石门湾几乎每人都有的六套换季的衣服(见《辞缘缘堂》):"夏衣、单衣、夹衣、絮袄(木棉的)、小棉袄(薄丝绵)、大棉袄(厚丝绵)。"我们那时自然没有这许多讲究。公公提起换季的衣服,只是感叹家乡石门湾是个多么好的地方而已,并不是"九斤老太"式的抱怨,对"一代不如一代"表示不满。

我们俩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公公有时向我们介绍外地的风土人情。那时交通不便,我们出上海也无非在江浙一带杭州、苏州、无锡或嘉兴走动,最远是去北京看姥姥,因此我们对国内其他地区没什么概念。公公兴致上来给我们讲他去台湾、香港、广东的见闻,给我们开眼界。

印象最深的是他告诉我们的广东食谱,比如说广东名菜龙虎斗,材料用的是蛇肉和猫肉,吃蛇和吃猫,在当时的上海是很难想象的,我们听了不免心惊肉跳。最让我们震惊的莫过于听公公描述在广东参加宴会。公公从来就不爱参加宴会,他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宴会之苦》,因为有人给他起了个诨名"三不先生":"不教书,不讲演,不宴会。"

公公在文章中写道:"我实在是生怕宴会之苦。希望我永生不参加宴会。""宴会,不知是谁发明的,最不合理的一种恶剧……我过去参加过多次,痛定思痛,苦况历历在目。"公公去广东时,当地为了欢迎他这位大名人特别举办一个隆重宴会,盛情难却,他只好去了。看到大圆桌上当中有一个小圆洞,他起先茫然不知其用,后来才知道当地人以此来吃新鲜猴脑,这是招待最高贵客人的,可怜的公公差点没昏过去!他本来就不喜欢参加宴会,更何况是这样的宴会。公公认为这样吃法实在太不人道。

近代虫侠传奇录

袁立

14.终于等到这一天

谭老板是规矩人,舞曲结束就向对方致谢老老实实回到自己座位上,从来没有外插花,对谁都一视同仁。唯一对王玲玉是五百年前的前世因缘,两个人一见钟情,特别要好,后来认定为结拜兄妹,干脆公开往来,谭太太是大家闺秀,深明事理,为人大气,没有半点吃醋,反而拿王玲玉当作自己闺蜜,大家和谐相处。后来谭敬拿出一笔钞票,送给玲玉父母养老,希望莫再干涉王玲玉的前途,傍上谭老板这个大户,王玲玉爹娘也是磕头烧香。于是王玲玉做了三年舞女之后跳槽上岸,正式到谭敬的公司上班,受聘为公关部经理。

谭敬和王玲玉一段感情应该处理得相当妥善,任何人也无可指责,也没得罪谁,做梦也想不到已经有人怀恨在心。所谓江湖水深,风云难测。原来谭敬真的得罪人了,这个人就是斧头帮帮主王开。斧头帮由安徽合肥人王亚樵发起成立,模仿青洪帮靠打杀起家,擅长暗杀活动,但是收费昂贵。最兴旺时期帮众达到十万之众,出场时一人两把小斧头,连杜月笙也不愿主动招惹他们。王亚樵因为刺杀蒋介石,误伤汪精卫,被戴笠设计杀死,侄子王开继承帮主之后,停止了暗杀活动,靠在上海公共租界收保护费维持生存,因安徽省连年灾荒,民不聊生的农民逃荒到上海,铤而走险的年轻人纷纷投身斧头帮,帮众甚多,成为上海滩上仅次于青洪帮的第二大帮会。

有次百乐门舞厅来了十几个外国烂水手,吃醉了酒发酒疯,轻薄非礼舞女们,保安上前劝阻一顿毒打,正准备砸场子时,王开正好进来看到,立刻命令手下四个保镖同时出手,一举击溃十几个流氓,打得统统跪下求饶。这个就是旧社会流传的八把斧头保卫百乐门,斧头帮帮主王开的传奇故事,一时传为江湖佳话。从此百乐门老板巴结王开,天天请其吃饭跳舞,只因生怕外国流氓去而复来。

王开也是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干脆就在百乐门蹲点,静安寺附近成为斧头帮的主要活动场所。自从王玲玉出道之后,王开是她的铁杆粉丝,频频向她献殷勤,吃她吃得服服帖帖,希望能够抱得美人归,偏偏人家王玲玉一门心思全在谭敬身上,对王开始终是不冷不热以场面应付为主。世界上样样东西可以用钱买,独有一样千金难求——男女的感情。王开没有办法,只好放慢节奏,想办法再慢慢哄其开心。想不到最后王玲玉"上岸"了,再也不去百乐门上班了,一打听下来,是谭敬挖到公司里去了。这下王开气个半死,把所有账都算到谭敬头上,一直在等待机会出这口恶气,终于等到这一天。

讲到此时大家可还记得"玻璃金背"出土于何处?没错!安徽合肥的虫王,到上海参加虫王争霸赛,最快得到消息的必定是王开!无巧不成书,王开从来不玩蟋蟀,什么虫王,将军,从他眼睛里看出去统统是一样的。只是有心报仇,耳朵天天竖了像小白兔,一听到争霸赛对手叫谭敬两个字,眼睛立刻碧碧绿,全身血液冲脑门。派人跟踪过去打听,手下人立刻把合肥的刘老板找来,王开发问,你和谭老板斗虫把握有多少?刘老板信誓旦旦以身家性命担保,他的玻璃金背是虫王,手下从无二合之将,已经走过十几路上风,皆是一触即溃!

王开大喜过望,谭敬啊谭敬,终于等到这天了,我要大大地出你洋相,叫你鼻青眼肿无法见人。王开马上打开保险箱,拿出二十根大黄魚,老早十两的金条叫大黄鱼,一两的金条叫小黄鱼,皆为其金黄色也。二十根大黄鱼合计就是两百两黄金,这个在当年是不可思议的天价。

再讲回到和平饭店斗虫的现场,王开晓得谭敬上海滩上也是大户人家,背景后台石骨铁硬,黑白两道统统都有朋友熟人,这个事情还须做在"路子"上,不好瞎来来。流氓做大了也要讲道理的,这叫"四方台子八方理,有理方才走遍天",无理取闹的是小流氓小混混,上海话叫"吃滥饭",意思就是不讲道理见钱眼开,看到谁都可以下手。"吃滥饭"传出去江湖口碑一下就降到零了,流氓做大了一定是讲道理的,实际上也是一句多出来的话——不讲道理的流氓也不可能做大。